

XIANGXIANG
YU
XUSHU

想象与叙述

赵 园 /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与叙述/赵园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606-2

I. 想… II. 赵… III. ①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②士大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D691.2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431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王景林

想象与叙述

赵 园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5 千字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606-2 定价: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几年前,出版演讲录一度像是成了风气。为这风气所鼓动,我也试着将在高校及其他处的演讲整理出来,却终于放弃了——那是一些书面化的“演讲稿”,不但拟之于前,且反复修改增补于后。也曾发表过几篇“录音整理稿”,无不经了事后的润色,只能称之为“仿演讲体”。既然不能忍受口语的啰嗦、为演讲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废话闲话东拉西扯、随机的“生发”,也就不能不牺牲了文字间的“现场性”。于是重新设计,就有了这样的一本小书。

本书的前一组文章,仍然以明清之际为时段,分别由几个较为具体的方面,讨论关于历史的想象与叙述:《瞬间》处理是关于事件的叙述,《忠义·遗民》讨论关于人物的叙述,《废园》则梳理某种象征隐喻在这一时段历史叙述中的运用。后一组文章是上述讨论的继续与延伸,而以明清直至当代有关元、明、清的叙事史学为分析材料。两组文章所取材料不尽相同,讨论的问题却有贯通且前后呼应。无论“想象”还是“叙述”,都非文学的专利。“叙述”之为课题,固然不只与文学、史学有关,“想象”作为能力,也非为文学者专擅;在本书的讨论中,更涉及精神史、心态史的层面,有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交集。

前此我关于明清之际的论述主要凭借文集,明清间的野史,近人的叙事史学的著作,写作本书时才集中地阅读。也因了这一番读史,更体会到了叙述之难,真切地感到了一代代知识人、学人寻求“历史真相”的艰苦努力。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也仍尽我所能地读了几种国外汉学著作的译本。我感兴趣的,当然是那些不同背景的学者想象古代中国、想象明代、想象明清之际的方式,尤其这种想象中陌生的方面。如若没有丰富的差异,这项研究会令我感到索然无味的吧。

明初的社会、政治面貌,要由元末以至有元一代来解释。除了某些具体的制度设施,那个延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朝代将什么留在了后续的历史中,并不那么清楚。对于元代,我却只能小心翼翼地“触碰”。事实上关于元明之际,前此已略有触及——明人与元遗民、元儒有关的言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下编第五章《遗民史述说》及该章附录《论许衡、刘因》)。说宋、说元,通常被明人作为言说自己的时代与自身命运的方式,有关的言论提供了深入明人的思想世界的线索。这些材料,无论治元史、还是治明代思想史者都不免会忽略。而“深入明人的思想世界”,是我所能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本书中的有关分析也仍然在这一方向上:明人以至近人关于元代的记忆与想象。于此我关心的更是普遍的知识状况——我们往往无知而有坚固的成见,不惟对于元代如此。涉及宋、元,我的兴趣依然在朝代的衔接处。我尝试着由“明清之际”伸展开去,尽管更像是一种意向、姿势。我相信诸多“之际”均有研究、开发的价值,只是自己力有未逮罢了。

这本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由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抽身,考虑一些诸如“方法”之类的问题,也借此反身回顾,将曾经的“研究”作为

考察、批评的对象——自己的研究赖以进行的条件及其间的问题，是我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避免直接面对的。《寻找入口》一篇，回顾关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史研究中寻找所谓“切入点”的过程，较之报告一项已经达到的结论，对于年轻的学人或更为有益。我一向缺少方法论方面的自觉；进行一项研究，也不大有“策略”方面的设计。正是“演讲”这种场合迫使我反刍。其实我更愿意告诉年轻学人的是，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径”，你所应当做的，是面对难题，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附录中关于治学的两篇，更贴近学术工作中的个人经验——并非认为已有资格谈“经验”，只不过从事既久，总有愚者千虑之一得，或可与人分享的意思，也可证我与本来的专业（即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失却联系：“杂谈”的某种针对性，多少也因演讲所面对的，主要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年轻人。

友人出了一本书，《害怕写作》，他的学生说，老师害怕写作，还写了好几本，不害怕又该如何。我其实是理解这害怕的。此外，还有一点害怕演讲，不能像我的不止一个友人那样，总能在讲台上挥洒自如。我常常会感到不知从何说起。这既与我的书斋生活方式，也与我的工作方式有关。在阅读与研究中吸引、触动了我的，通常较为具体琐细。我可以找到适宜的文体容纳它们，而那些意思也像是只宜于书写。由此也更相信自己的所谓“研究”，极其依赖于文字组织。一些混沌的想头、混茫的思绪，一旦明白说出，有可能意味全失的吧。“烦碎杂沓”而“寡要”，缺乏统摄性的“问题”，也缺乏支持“统摄”的理论体系，我将此视为能力上的缺失，对研究生说，他们可以用一种简便的方式自测，即为自己的论文写“提要”，倘无“要”可提，那么论文能否成立就大可怀疑，却又对此不无

游移——“提要”是否真的是有效的自测方式？所谓“论文”也者，是否真的有划一的标准？

既然有“演讲录”的设想在前，即使不曾都用于演讲，最初的设想仍然影响了写作的方式与态度，即如近于“倾谈”的那一种态度。被“论文”、“专著”捆绑的时间太长，原本希望多少打破学术文体的拘束，稍稍舒张一下肢体，却又因不能容忍散漫与随意，将“逸出”的部分一删再删，终于写成了现在的样子。“自由”不可能仅由文体承诺，那更像是一种所谓“心灵”的能力。据说东欧开放之初，有作家发现自己竟不会写作了，对那突如其来的“自由”无福消受。我的问题是另外一种，即因了学术的“规训”，也因了积习，早已不能“信笔所之”。但既有讲稿的基础，与论文就有了不同，写作中也较有对象感，诉诸大致明确的受众，是用之于特定情境的文章。演讲不同于论文，也不同于通常的对话、交谈的，也无非“态度”。这本小书与我已经问世的所谓“专著”的不同，即在此“态度”。

我曾讨论过明代士人的讲学。由理学语录及其他讲学记录，不难想象其时情境，发生于这一特殊场合中的故事。也曾在散文中写到自己与讲台有关的经验，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讲台上下互为激发、“煽动”的情境。即使经历过那种时刻，我也仍然更习惯于书斋中的写作：你可以想象读者，也可以不想象。即使偶尔面对听众，观察也极粗疏，甚至不如鲁迅笔下的高老夫子，尚能瞥见半屋子的眼睛，“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以及“蓬蓬松松的头发”。却也略有一点故事。在上海某校演讲后，友人发给我网上的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某位女生提问时，大家应不应该发笑，赵老师应不应该也发笑；赵老师为什么不正面回答女生的提问，而是让她去查书。我对友人说，他的学生很厉害。另有一个细节。也是在那所

大学,一个小女生走到我面前,说,她觉得我“特慈祥”。

此外还能记起的,是在文学所向几个研究生授课。那往往不是在“返所日”,长长的走廊昏暗而空洞。学生们沉默地听着,使得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像是流荡在荒漠中,没有回声。那真的是一种特别的经验。

写这本小书,系应培元之约;对于我的一再延宕,培元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书稿完成之时,除了一向支持我的大陆的友人、同行与读者,我要感谢台湾的学者,与他们的交流,在我,是一种美好的经历。我还要感谢《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的责编张凤珠先生,《易堂寻踪》的责编张国功先生,感谢他们为我的这项研究的面世付出的心血。

在本书中我曾谈到学术研究的作用于研究者。这里我得说,写作本书,无疑多少影响了我面对历史时的感觉。每一项研究都有可能让你有一点改变,即如改变了一点你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否也正应当是你所期待的?

赵园

2009年5月

目 录

那一个历史瞬间	001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	001
是日前后	015
南一北	026
山,湖,与海	032
兵、贼、盗、虏、义军	036
当面之敌	040
裂变的家族	048
方死方生	050
废园与芜城	054
明末士大夫之营园	054
祁彪佳与他的寓园	059
作为符号的废园与芜城	073
忠义与遗民的故事	085
再说祁彪佳其人	085
忠义心事	091

“污点忠臣”	095
不经之谈	104
最后的抵抗者	110
忠义—遗民	115
遗民—时间	124
所谓“小一代遗民”	129

想象与叙述

——由明清之际说起	136
关于“之际”	136
想象明清之际	146
“突围”路径	157
关于明末清初的历史叙述	169

再说想象与叙述

——以明清之际、元明之际为例	179
再谈明清之际	180
元明—明清之际	190
“元亡而实未始亡”	203
知识人的元代记忆与想象	207
宋元—明清之际	218
〔附〕关于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文学	224
《流星雨》——如何想象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227

附录一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	231
《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后记	243

《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后记	253
附录二	
思想·材料·文体	
——治学杂谈之一	259
视野、境界及其他	
——治学杂谈之二	282
寻找入口(代后记)	300
征引书目	327

那一个历史瞬间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即西历 1644 年 4 月 25 日，明朝京城陷落。有关这一事件的诸种记述（包括近人的叙事史学著作），几乎都提到了那个关键时刻的天气。你不难注意到，叙述者最希望传达的，是其时的气氛；而当日的天气，似乎有意地参与了气氛的营造，只是为了使那一时刻更加深入人心。无名氏《燕都日记》记十八日的京城，说“先是连旬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至”；“十九日，平明，寂然无声。微雨后，雾障迷目”（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页 105）。时陈济生在城中，其《再生纪略》记十八日晨，“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愁惨异常”（上，冯梦龙辑同书卷四，页 69）。当日也身在城中的赵士锦，事后记城破时分，“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冯氏辑《甲申纪事》附《北归记》，页 21）。“凄”、“苦”、“愁惨”、“惨杀”，多少也是记忆中的个人心情为天气涂染的颜色。^① 近人樊树

^① 《明季北略》卷二〇《十八日申刻外城陷》：“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页 452），所记乃十八日晨。十九日，“昧爽，阴云四合，城外烟焰障天，微雨不绝，雾迷。俄微雪，城陷”（同卷《李自成入北京内城》，页 455）。同书卷二三《李自成入京城》写三月十八，“黄沙障天，旋风刮地，雷雨交作”，“天气阴霾，日光凄惨”（页 670）。冯梦龙《甲申纪闻》得之于传闻，说十八日上午，大雨（冯氏辑《甲申纪事》卷一，页 6）。《国榷》记这一时刻：“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卷一〇〇，页 6047）。无不强调天气对此一事件的参与。

志《晚明史(1573—1644年)》半据文献半由想象,对那个夜晚作了如下描述:“三月十八日夜,内城各门全部打开,炮声顿时停息,李自成军队已经控制了京城。京城上空烟火弥漫,微雨不绝,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页1129)天气作为一个角色,其功能像是只为了传递不祥的消息:一个王朝终结在凄风苦雨中。这种暗淡的情境刻画,显然包含了如下判断,即明亡是一场悲剧。本来,那一时刻既是结局又是开端,方死方生,却被由特定的方向作了描述。其实描述者未必都以为明之亡值得如此哀挽;或可能只是沿用文献现成的说法,甚至有可能更着眼于修辞——使文字更具有情绪的感染力。但至少由字面看,诸书作者当写下上引文字时,关注的更是一个王朝的终结,而非另一个王朝的兴起。

下文将要谈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说:“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尽管由该篇看,所祭不止“明亡”,甚至更在李自成的失败,^①但“甲申”毕竟是大明王朝的“忌日”。前此任何一个朝代的覆亡,似乎都不曾引起过如此沉痛的“纪念”。

关于当日京城接下来的一幕,诸书的描述有详略之别,务期“惊心动魄”则是一致的。《甲申传信录》写道:“十九日黎明,时人马喧嘶,城中鼎沸。德胜门,齐化门,阜城门,宣武门,正阳门,同时俱启,守城者争下,裂弃戎衣征袍战靴而走……”(卷一,页17)该书的作者其时并不在现场;据他说自己是四月十六日回到京城的。冯梦龙《甲申纪闻》说攻城之际,李自成军“衣黄罩甲,四面如黄云蔽野”(冯氏辑《甲申纪事》卷一,页6);且说十九日“城中火起,顺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就说:“是书著于一九四四年……恰为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之三百年,故著为是编,以资纪念。又鉴于当胜利到来之时,不致因胜利而骄矜,以提高警惕”(卷六《农民起义》上,页288)。

成、齐化、东直三门，一时俱开”（同上，页7）。《明季北略》卷二〇《李自成入北京内城》并存异说，一云曹化淳、张缙彦开彰义门迎“贼”；一云张缙彦坐正阳门、朱纯臣守齐化门，一时俱开，“闻城中火起，顺成、齐化、东直三门，一时俱开”；一云“得胜、平则、顺成、齐化、正阳五门，一时俱开”（页455）。无论三门、五门，也无论系何门，“一时俱开”，想必有特殊的震撼性。

门开之后的场面，更传闻异辞。即如李自成军入城之际的動作行为，我所见的几种记述，就言人人殊。赵士锦事后追记见闻，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进城，“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枚贯走。百姓门俱闭，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音”；当日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冯氏辑《甲申纪事》，页9）。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据此篇的记述，以为农军“确实有点秋毫无犯的样子”（下卷第一三章，页1134）。^①《明季北略》卷二〇《李自成入北京内城》：“贼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页455）。《国榷》记李自成军进城的当日，“榜示开业，罢市者斩。兵政府榜曰：‘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有二贼掠绢肆，磔于市。市民闻，大喜传告，安堵如故”。（卷一〇〇，页6048）《燕都日记》却说是日“贼众填塞街衢，搜索骡马、儿童、妇女，哭声震天”。^② 尽管孟森说过，“多一异同之

① 但赵士锦该书还记有“日间百姓尚不知苦，至夜则以防奸细为名，将马兵拦截街坊出路，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淫妇女，民始苦之。每至夜皆然”（页9）。顾诚《南明史》没有关于李自成进城的具体描写，只说“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页3）。

② 《再生记略》极写是日“贼”杀掠之惨。如曰“各衢衢步骑如织，以献驴马为名，恣行杀掠。男女杂踏呼号，倏聚倏散。趋者、蹶者、刀砍者、箭伤者、惊死扑地者、悬梁者、投井者、走奔堕胎者、委襁褓而去者、为众挤什者、墙压者、马蹂垂命者、断手折踝者、剖腹者、截耳者、割须发者街巷狼藉，哭声如雷”（上，冯氏辑《甲申纪事》卷四，页71）。程源由他人口中听到的，亦“贼入城，纵兵大掠杀。城南一带，皆熏粉。妇女奸污死者，并洿梁屋皆满，城中哭声震天”（《孤臣记哭》，冯氏辑《甲申纪事》卷三，页56）。

本即多一推考之资”(《书樵史通俗演义》,《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页170),在有了关于“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经典论述之后,农民的形象非同小可,李自成军进城这一关键时刻,却被诸多或凭了传闻、或声称“亲历”者叙述得如此参差错落,想必使史学家遭遇了取舍之难。

记述者当日是否身在京城,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在京城非即在“现场”。由诸种记述看,其时未及出逃的士人,藏匿惟恐不深,所知也得诸传闻;所见固可能囿于一隅,所闻也不免会是一面之词。也因此亲历者的记述,在历史文献的选择中并不就理应具有优先性。记述者所处的具体位置之外,另有其人的判断力以至书写能力,乃至事后(即使极贴近“现场”的事后)追记中无可避免的整理——依惯例、流行样式、通行文类、共用修辞手段,等等。最不可信的,是“传信”之类的标榜。钱澄之的《所知录》,黄宗羲以为与《传信录》、《劫灰录》均“可考信不诬”(《桐城方烈妇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页460),全祖望已不以为然(参看《鮑埼亭集》外编卷二九《题〈所知录〉》)。①《甲申传信录》,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录徐鼐《小腆纪传》,以为是书“颇不失实”(页349),黄裳则说该书“错误百出”(《不是抬杠——评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页246)。在我看来,上述文献更宜于作为了解其时人们的感受的材料:他们由哪些方面领受了“易代”所带来的震动,承受了何种方向上的冲击,以及作何反应,等等。由上文所引文字看,士大夫在这个瞬间的紧张感,所感受的震撼,的确可用了“天

① 傅以礼又有对全氏之说的不以为然(参看傅氏《华筵年室题跋》卷上《所知录》)。

崩地坼”来形容。

至于当日京城百姓的反应,较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是顺从。上文已引“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燕都日记》则记该城居民“面帖‘顺民’二字,继而又书‘永昌元年’,或又书‘顺天王万万岁’,庶几免祸”(页106)。^①三天后这些顺民经历的大洗劫,绝非他们此时所能料到(参看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译本,页258—259)。据说劫掠之后,居民得到了吴三桂在山海关获胜、明太子即将复位的传闻,“不禁欣然泪下”(同书页279)。无怪乎经历了那段历史的士大夫以为,最反复无常的,就是“民”。

这一天京城中上演着诸种故事,被史家以为最值得记述的,是崇祯之死,以及明臣的动向。

王朝更迭(即所谓“鼎革”)本是一个发生在时间中的具有连续性的过程。使这一事件以明确的日期为标记,通常因了那个日子都城陷落、君主被废黜或死亡(自杀抑他杀)。都城陷落与君主之死,被作为一个王朝覆亡的确证——即使此后仍有连绵的战事,有抗拒与反扑。本篇选取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这个“历史瞬间”,不完全因了它在事实上的重要性,或者说更因了它被认为的重要性——由当时直至晚近。而它在事实上的重要性,主要也是被由两个相关的事件论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与崇祯自缢煤山。发生了如此事件的日子,其被认为重要,是无须解释的,即使这个日子

^① 《燕都志变》(聋道人述)记“城中家户,用黄纸书大顺永昌牌位、祀奉人。以黄纸书‘顺民’二字插鬓边,然后出市行”(《豫变纪略》彭家屏刻本附录,《甲申史籍三种校本》,页330)。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燕都志变》原题聋道人徐应芬述;《荆驼逸史》中之《遇变纪略》,《昭代丛书》中之《燕都识馀》,均为该书(页352)。

是否明亡的确切日期仍有争议。^①或许明亡本没有“确切日期”。明亡是一个过程。局部的“亡”，三月十九日前就在进行；而三月十九日之后，即永历之死也未必就终结了这一过程。我还将谈到，遗民的存在，将明亡这一事件在时间上大大地延展了。倘若考虑到遗民、类遗民现象几乎终有清一代，确定明亡的日期更显得过于学究气。但这并不就降低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作为时间节点的重要性。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之非同寻常，仅由下面的事实也可以证明。

1944年3月19—22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于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这里的3月19日是西历。毋宁认为，这一精心选择的刊出日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提示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这个日期的重要性。在3月19日刊出该文，而不考虑受众那里可能发生的混淆——

① 吕思勉的《中国简史》即以1662年永历为吴三桂所杀为“明亡”（参看该书第四编第一章，页293）。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即说“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而发表于1944年4月15日《群众》周刊的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一文，却一再表明自己不认为甲申乃明亡之岁（《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页51、5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以三月十九日为明亡（页245）；翦氏主编之《中外历史年表》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却有“明自太祖开国至思宗共二百七十七年，至永历帝共二百九十四年而亡”云云（页695）。孟森更断明亡于康熙三年，说张煌言死，“明乃无人”；鲁王死，“明亡”（《明清史讲义》第二编第七章，页361）。通常所谓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或二百七十七年），是不将南明诸朝所历时间计算在内的。谢国桢《南明史略》谨慎地避开了有关判断。顾诚《南明史》以为崇祯自缢、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页1）。较晚出的樊树志的《晚明史（1573—1644年）》，亦以为崇祯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页1132）。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南明史（1644—1662）·引言》中说，1644年“并非明亡清兴的分界线”，因为皇太极1636年就做了清的皇帝，而永历直至1662年才被灭（中译本，页1）。关于明亡的日期，清人的说法即互有不同。《南疆逸史》有“是岁（按即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緬人献永历帝，明亡”的字样（卷五四，页433）。张岱《石匮书后集》却断然道：“崇祯甲申三月，便是明亡”（卷五，页49）。明亡时间的认定，关系南明诸朝的历史是明的“后史”，抑明史的一部分。在王朝史的框架中，绝非无关紧要。至于赵翼《廿二史劄记》所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卷三五《万历中矿税之害》，页502），则是明亡后的一种常谈。